



# 發揮獨特優勢大力拓展中亞新興市場



議事廳  
陳清文

今次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出訪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對於落實施政報告提出，鑄定中亞合作對接，更好開拓新興市場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本人隨同代表團出訪，訪問活動正在進行中，感觸良多，同時也有些思考。

此次是特區政府高層首次訪問中亞地區國家，不僅對香港與中亞地區的經貿交流合作起到促進作用，也是推進雙方經貿密切往來常態化的有力舉措，更是助力「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具體行動。僅從代表團組成就體現出來，特首親自率團帶隊，特區政府多位官員參加，彰顯重要性。還有60多位跨行業的商貿代表，來自香港工商、金融、法律、物流及科創的代表，內地能源、礦業、藥業及高端製造業等企業代表，各佔一半，再次體現了兩地企業攜

手「併船出海」，成為香港深入參與「一帶一路」商貿拓展的創新和常規做法。

## 更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特首率團出訪中亞兩國，是對當前全球地緣政治變化充分評估，持續推進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戰略，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更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之舉。國家與中亞國家經濟交流合作日趨加強，雙方貿易規模已連續五年保持正增長，去年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成為中亞五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給各國帶來新發展機遇。

香港清楚認識到，國家與中亞的雙邊貿易規模擴大會倒運規則、標準與配套服務升級，促進向產業增量的轉型，實現高效的產業對接與園區合作。貿易額的大幅增長，使雙方有條件把貿易關係升級為產業鏈夥伴關係，獲得更安全、更有韌性的區域供應鏈網絡。例如，雙方推動跨境電商、智慧物流等數字經濟發展，「中國—

中亞貿易暢通合作平台」吸引超過500家企業入駐。尤其是與中亞合作熱度不斷攀升，地方對接合作非常活躍，2026年甘肅省對哈薩克斯坦出口同比增長168%，上海、天津、廣西等地與中亞各國在經貿推進會上簽署多項合作協議，雙邊關係進入享受合作制度紅利的階段。中亞地區與我國的經貿合作越走越實、越深，成為「一帶一路」關鍵節點，作用十分重要。

香港緊抓機遇，推進與中亞國家經貿合作。從2020年到2025年，雙方的商品貿易總額增長27%。前年，香港經貿代表團訪問了哈薩克斯坦，深刻體會到與中亞各國開展經貿合作的潛力巨大，並積極付諸行動，促成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來港路演，尋求合作；其後哈薩克斯坦開發銀行在港發行20億元離岸人民幣債券，去年哈薩克斯坦礦業公司在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增強中亞國家企業來港上市的意願和信心，標誌着香港與中亞國家

的合作正在走向具體落地。

去年香港與中亞國家的出口總值超過3.31億美元，其中，哈薩克斯坦佔近六成，烏茲別克斯坦約佔一成三，是主要貿易夥伴。哈薩克斯坦與香港開展金融方面合作已見成效，並有多項合作在積極推進。這兩個國家是外資進入中亞市場的樞紐，持續加強與兩國的金融合作，對於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今次特首率領史上最大代表團出訪中亞兩國，深化區域經貿合作，拓展更大合作領域，為香港建立更多商貿通道，開拓富有機遇的新興市場，出訪目的十分明確。

## 「內地實業+香港服務」聯手出海

從兩天訪問情況看，雙方商貿推介、洽談熱絡，積極推進交流合作和項目對接。充分發揮香港優勢，着力拓展中亞市場，主要包括：港交所提供多元化融資平台，吸引來港上市的中亞國家企業會倍數增加；

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為中亞基建和資源項目提供融資及發債服務；依託與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相通普通法體系，香港為內地及中亞企業提供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香港協助資源豐富的中亞國家對接資本，引導、促進綠色發展；以輸出數據中心、5G專網等「數字絲綢之路」解決方案，助推中亞國家產業升級；採用「內地實業+香港服務」模式，讓更多內地企業聯手出海，共同開拓中亞市場；吸引更多中亞學生來港升學、就業，為國家與中亞的穩定、長遠合作搭建橋樑、夯實基礎。

這次訪問必將把建立在與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經貿基礎上的扎實合作，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推進，使香港與兩國的經貿合作進入機制化、常態化，更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 講清兩件事

# 以兩岸和平塑造大國共贏新典範



兩岸觀察  
鄧深迪

五月中旬特朗普訪華時，習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會談中再一次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特朗普在返回美國後接受專訪時也強調不希望看到「獨立」，這無疑對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6月1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問美國，在中美關係企稳，兩國共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之際，台灣地區最大在野黨領導人訪美，不僅受到島內和大陸觀察人士的關注，也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極大的關注。

## 兩岸和平有利於各國利益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是台灣問題衝破底線滑向消極的後果，卻不會僅僅影響海峽兩岸，而會由整個區域甚至全世界承擔。「反台獨」是大勢所趨，更是全世界的共識，之所以形成這一共識，實際上就是全世界主要國家都認識到，台灣問題和海峽動盪會牽動世界局勢和人類發展。美國部分軍事人員長期以來認為兩岸局勢不穩定，鼓吹所謂「戴維森窗口」，日本部分政客也不斷試圖將軍國主義的陰風吹向島島。這些陰謀雖然不會改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的事實，但都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即台灣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決，兩岸關係如果不能維持和平發展，則整個東亞區域的和平也將毀於一旦。按照美國的說法，兩岸衝突將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在10萬億美元量級上，其後果將由全世界共同承擔。在這樣的環境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一直堅持「九二共識」和「反台獨」底線，堅守兩岸和平發展的立場，值得進一步發揚。

在鄭麗文訪美前夕，「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放言要求鄭麗文解釋其「政治取向」，更是被綠營人士認為是批評其「忽略美國與日本等傳統盟友的利益」。事實上，筆者認為，與其解釋無中生有的指責，國民黨更應當抓住機會告訴世界，至少從兩個方面看，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兩岸關係都將為全人類帶來更好的未來。

一是講清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於世界各國的利益。大國之間的關係，自身的國家利益都是一切考慮的出發點，這無可厚非。鄭麗文此番訪美也將前往哈佛大學會晤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中美關係必然在討論之列。雖然台灣問題是國家統一的

「家務事」，但這件「家務事」如果能給世界各國的利益帶來共贏的機會，則國家統一的外部阻力必然會大大降低。

以香港回歸以來的情況為例，1997年回歸以來，美國和英國的在港投資不斷增高，投資總額超過萬億港元，近日更是獲得證實香港已於去年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這正是國家的統一和安全的治理賦予了香港穩定和可預期的未來，讓世界各國的利益能夠在香港實現共贏。在台灣問題上同樣如此。確保兩岸的和平穩定，能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利益創造更多價值。事實上，鄧小平在談及香港問題時也明確指出，香港的回歸不僅保護中國人的利益不受損害，外國人的利益也不受損害。在這個基礎上，台灣在國家統一的進程中具有獨一無二的潛力，可以努力從區域穩定的「導火索」變為中美合作共贏的「減震器」。

## 充分認識分裂行為嚴重後果

二是講清楚兩岸和平的最大障礙在「台獨」。長期以來，一些台灣同胞產生了兩岸已經處於分裂狀態的誤解，一方面使「台獨」分子及其理論利用「維持現狀」的方式不斷推動「台獨」分裂活動；另一方面也使部分長期活躍在兩岸交流領域的人士將兩岸交流當成了生意，事實上受惠於兩岸隔絕的現狀，當起了兩岸之間的「兩面人」。如5月份被大陸企業解聘的「台獨」頑固分子親屬，就長期利用兩岸的現狀進行分裂活動。事實上，台灣目前並不是「沒有『台獨』的問題」，而是部分台灣民眾沒有充分認識到分裂行為會帶來多嚴重的後果。《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的介入條件並不是泛泛而談的彈性條件，而是有標準、有後果的「硬底線」。一旦「台獨」勢力越過這條底線，不論其在言論上如何找補「維持現狀」，都將面臨地動山搖的嚴重後果，並牽動整個區域和平與全人類利益受損。

以上兩個方面互為正反，如果鄭麗文和國民黨能夠藉參與國際交流的機會，從這兩個方面講清楚兩岸和平的好處和障礙，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兩岸和平的新論述，則有機會形成一種更深層次更廣內涵的「新共識」，從而能夠使得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成為實現國家利益共贏的新典範。

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借鑒德國經驗

# 深化北都「產學研」融合



議事廳  
陳克勤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早前率領代表團訪問德國海爾布隆教育校園，實地考察其推動產學研融合、初創孵化及跨領域合作的模式。這一座匯聚了應用科學大學、頂尖科研機構與產業網絡的綜合性大學城，不僅為正在籌劃中的北都大學城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國際參照，更為香港如何通過教育體制變革驅動經濟高質量轉型，帶來了深刻的實踐啟示。

長期以來，香港的高等教育體系以學術研究見長，多所大學在國際排名中名列前茅。然而，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香港正全力由傳統的單一服務型經濟向多元化的高質量發展轉型，特別是大力發展創新科技及先進製造業。在這一關鍵節點上，特區政府明確提出在北部都會區建立應用科學大學的策略，無疑是眼光長遠的戰略部署。對於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香港而言，應用型大學的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放眼全球，任何一個在高端製造業或創科領域佔據前沿的經濟體，其可持續發展的底氣，都離不開產業與教育的深度結合。以美國為例，矽谷依託史丹福大學與柏克萊加州大學，波士頓則圍繞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大學，形成了學校研發、企業投資、成果迅速產業化的閉環，這種緊密的產研互動圈讓兩地長年成為全球創新的「核心大腦」。而國家在過去短短數十年，成為擁有全產業鏈的全球製造業巨人，其背後最核心的支撐，正是國家戰略下所構建的龐大高等工科教育體系和對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國家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工科與技術畢業生，構築了國家科技創新與工業升級最堅實的底座。

## 灣區共同培養技術人才

除此之外，特區政府借鑒德國經驗，視野還可從應用科學大學進一步放寬，關注支撐「德國製造」享譽全球的另一大基石，即著名的雙軌制職業培訓模式。未來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將進行更深度的產業協同，共

同構建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高端製造業集群。無論是新能源以至智慧醫療設備的生產與維護，除了需要頂尖科學家和研發工程師，更離不開大量擁有匠人精神、掌握精湛技藝的高級技術工人。目前香港在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同度及資源投入上，與德國等先進經濟體仍有較大差距。要在大灣區構建完備的高端製造業產業鏈，特區政府應前瞻性地關注職業教育的改革，思考如何令大灣區龍頭製造企業，與香港的職業院校開展更具針對性、前瞻性的培養模式，共同制定課程標準，推動兩地在高級技術職稱與職業資格上的互認，擴大技術人才的發展空間。

當前，以大語言模型和具身智能為代表的科技變革正在重塑全球就業市場。許多過去被認為穩定的白領工作正面臨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風險，而這恰恰為職業教育的轉型帶來了新的空間。英偉達創辦人黃仁勳預測，在人工智能時代，諸如建築工人等需要與物理世界進行複雜互動、具備高熟練度動手能力的藍領階層，未來的薪酬待遇將會非常豐厚。

## 打通青年向上流動廣闊路徑

因此，特區政府需關注科技變革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重新定義和發展職業教育。未來的建築工人、新能源產業工程師可能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者，而是懂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操作自動化機械的新型技術人才。通過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創造優質就業機會，不僅能打破社會對藍領的刻板印象，更能讓青年有更多優質就業的多元機會，打通更廣闊的社會向上流動路徑。

代表團此次考察德國，為北都大學城規劃帶回了寶貴的國際經驗。期望特區政府以建設應用科學大學為契機，橫向借鑒世界其他經濟體產研融合的成功經驗，發掘職業教育與技術工人培育的潛力，應對人工智能時代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唯有將產業需求與教育高度對接，北部都會區才能真正形成具備自生能力的創科生態，為香港及大灣區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撐與人才保障。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 從日本設立「情報局」看東亞安全格局的新變數



看大勢  
鄧飛

近日，日本參議院通過「國家情報局設置法」，把原來的「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為「國家情報局」，並在其上設立由首相直接領導的「國家情報會議」，計劃今年夏天正式掛牌，初期編制約700人，並計劃到2027財政年度末設立專責海外情報收集的「對外情報廳」。這項改革的核心，不只是改名，而是賦予新機構「綜合調整權」，使它能够突破警察廳、外務省、防衛省、公安調查廳等部門長期各自為政、資訊壁壘森嚴的局面。

對於這一變化，要放在日本近現代情報機構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英國情報史學者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日本情報機構秘史》指出，日本情報傳統有一個鮮明特點：它不只是為了了解世界，而是為了改造日本、擴張日本、強化日本。因此，今日日本設立國家情報局，表面上是因應網絡攻擊、虛假信息、外國

滲透、政治安全和國際環境變化；深層上則是日本國家能力「重組」的一部分：所謂「修補」戰後因受制於和平憲法的日本情報體系。

第一，是部門分散、各自為政。過去日本情報活動長期分散在警察、外務、防衛、公安調查等不同省廳。內閣情報調查室雖負責匯總，卻缺乏強制協調權，只能平行協商，不能真正指揮。當某省廳不願配合，內閣情報調查室也無能為力。這類似二戰期間日本情報體系的一個老問題：陸軍、海軍、外務省、秘密社團、殖民地機關各有一套系統，情報很多，判斷卻未必統一。珍珠港、中途島、對美判斷、對蘇判斷，都暴露過情報與決策脫節的問題。

## 「正常國家化」的危險一步

現在設立國家情報局和國家情報會議，正是要把「情報匯集」變成「情報統帥」。

第二，是對外情報能力不足。戰後日本在和平憲法和美日安保框架下，長期依

賴美國情報「分享」，自己的對外情報機構沒有完整建立。日本各情報機構主要「向內看」，真正「向外看」的力量嚴重不足；因此日本計劃在2027財年末前設立「對外情報廳」。這意味着日本正在擺脫對美國情報的依賴，走向建立更自主的海外情報能力。這不是單純行政改革，而是日本安全政策走向所謂的「正常國家化」重要一步。

第三，是情報人才結構老化和技術能力不足。傳統情報依靠人脈、語言、地理、僑民、商社和駐外人員；現代情報則需要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大數據、衛星、開源情報、金融追蹤、社交媒體分析和心理戰技術。日本政府計劃設立專門情報官招募考試，並向民間廣納外語、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專業人才。這意味着日本正加大對創新科技情報能力的投入，繼而轉化為國家安全情報能力。

對東亞和平而言，日本情報體系升級帶來的最大問題，不在於它會立即重演軍國主義，而在於它會使日本在軍事、安全、

外交、科技和輿論領域具備更強的主動塑造能力。日本一旦擁有更統一的國家情報局、更強的海外情報收集機構、更深的網絡與人工智能能力，它便不再只是美國印太戰略中的駐軍及後勤基地，而會逐漸成為情報、輿論、科技和地緣安全行動的主動參與者。這至少有三方面負面影響，值得持續關注：

其一，日本可能更深入地介入台海、東海、南海與朝鮮半島問題。過去日本在這些問題上已經不斷配合美國，以「自由開放的印太」為名推動軍事存在正常化。情報能力升級後，日本可在海空監視、島鏈封鎖、反潛部署、網絡攻防、政治滲透、輿論引導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這會加劇東亞安全危機。

其二，日本會更有能力參與對華科技競爭和產業圍堵。日本本來就是半導體材料、精密機械、機床、化工、電子零部件、海洋技術等領域強國。若情報體系與產業政策、安全審查、出口管制、科研合作審查結合，便可能配合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發

展形成更細密的限制網。

## 圖強化政治滲透能力

其三，日本可能在國際輿論與政治影響方面更主動。日本國會已討論外國代理人登記、公示制度等問題，反映其對「外國勢力滲透政治決策」高度敏感。但是同樣道理，日本自身情報能力提升後，也可能更積極地在周邊國家、國際組織、智庫、媒體、學術網絡和非政府組織中塑造對華敘事，把中國正常發展包裝成「威脅」，把日本軍事正常化包裝成「防衛」。

因此，面對日本情報體系的發展，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掉以輕心。從戰略上看，中華民族復興有其歷史大勢、制度優勢、產業基礎、市場規模和文明韌性。日本即使建立國家情報局，也改變不了中國發展壯大的根本趨勢，更改變不了亞洲力量格局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事實。不被日本一項機構改革牽牽走，也不應把日本情報能力神秘化、恐懼化。還是那八個字：戰略藐視，戰術重視。